

## 孔子“兴”式教育法与 《诗》《易》的义理化

刘保贞

(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)

**摘要:**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,《诗经》和《周易》是他教授弟子的重要内容,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《诗》《易》的辞句,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“忠恕”之道来。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“兴”式方法,即仅据《诗》《易》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。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“忠恕”之道去“兴”。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《诗》《易》改造成儒家经典的。孟子、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。

**关键词:**孔子;兴;《诗经》;《周易》

**中图分类号:**B222      **文献标识码:**A      **文章编号:**1001-9839(2002)01-0045-05

### Confucius' s Teaching Way of Xing and the Argument Transformation of *The Book of Songs* and *Zhouyi*

LIU Bao-zhen

(Research Center of *Zhouyi*, Shandong University, Jinan 250100, China)

**Abstract:** Confucius was a great educationist, and *The Book of Songs* and *Zhouyi* were important content he taught his disciples. He didn't merely ask his disciples to remember the words and sentences of *The Book of Songs* and *Zhouyi*, he wanted them to learn the doctrine of loyal and forbearance. The way Confucius used was *xing*, garble a statement from the words and sentences, which were very popular at that time. And Confucius had used the way of *xing* remake *The Book of Songs* and *Zhouyi* to be scriptures of Confucian school. Mengzi, Xunzi and Confucian scholars before the middle stage of Han dynasty all inherited the way of *xing*.

**Key words:** Confucius; *xing*; *The Book of Songs*; *Zhouyi*

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,号称弟子三千,贤者七十二。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将弟子们培养成一个能

收稿日期:2001-09-09

基金项目: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“九五”、“十五”规划项目。

作者简介:刘保贞(1966-),男,山东鄄城人,讲师,历史学博士。

处处用儒家思想上佐国君、下安百姓、出使不辱使命、闲居不忘大道的“士”，弟子们出师后的择业目标就是要“仕”，所谓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所以当孔子问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等人的志向时，直性子子路“率尔而对曰：‘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’”孔子虽嗔怪子路一点也不谦虚，但对他的想法还是基本赞同的。<sup>[1]</sup>《先进》孔子自己虽说“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”，<sup>[1]</sup>《子罕》但他是不屑教弟子“鄙事”的。当樊迟问种庄稼、种菜的事情时，他很不高兴地回答说“吾不如老农”，并大骂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！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，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！”<sup>[1]</sup>《子路》

孔子教育弟子，除平时的言传身教外，也有固定的内容，那就是被后人称作六经的“六艺”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这六门课程并不是同时开出的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是孔子早年开出的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则是晚年才开出的。《述而》说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<sup>[1]</sup>对这句话的理解，过去曾存在着很大的分歧，现在我们基本搞清楚了。他的实际意思是说：假使我早几年，从五十岁的时候就学《易》，那么现在我就不会犯大的过错了。帛书《系辞》里也说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居则在席，行则在囊。”<sup>[2]</sup>这些都足以说明孔子是在晚年的时候才开始研习《周易》，并把它传授给弟子的。《春秋》更是孔子晚年“病没世而名不称”，惧道不行，无以自见于后世，而以鲁国《春秋》为主，参考其他各国史记而修订的，他对史实“笔则笔”、“削则削”，使《春秋》充分体现了他的“忠恕”、“仁爱”等思想。<sup>[3]</sup>《孔子世家》

“《书》记三王之事，故长于政”，<sup>[3]</sup>《太史公自序》从中可以学习借鉴先王的统治经验；《礼》是西周时期各阶层人士的行为规范和典章制度，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都说是孔子采集西周的礼仪编纂而成，也是“治人”之人的必备知识；《春秋》是史，记载了当时统治阶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，自然也有学习的必要。孔子把这几本书作为培养弟子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教材，自然是十分恰当的，但他又把含有“郑卫之音”之类淫声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以及与“怪力乱神”有染的卜筮之书《周易》也作为教材，并给予高度重视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要搞清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从孔子的教育方法上入手。

孔子以这“六艺”教育弟子，并不是仅仅要他们掌握这六经的词句，而是要他们从中领会出孔子一生所孜孜追求的“一贯之道”来，并能把它用到实际的政事活动中去。孔子说：“《礼》云《礼》云，玉帛云乎哉？《乐》云《乐》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<sup>[1]</sup>《阳货》又说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於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<sup>[1]</sup>《子路》孔子教授学生，采用的是启发式教学法。孔子说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<sup>[1]</sup>《述而》颜回能闻一以知十，备受孔子和子贡的称赞，两人都自叹弗如。<sup>[1]</sup>《公冶长》孔子十分推崇《诗》，反复要求弟子们学《诗》。他问儿子伯鱼：“女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面而立也与？”<sup>[1]</sup>《阳货》在孔子看来，学《诗》不仅可以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，可以“群”、可以“怨”，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“兴”，即可以生发联想，从中体会出“迩之事父、远之事君”的大道理来。<sup>[1]</sup>《阳货》子夏能从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”这几句描写女子漂亮的诗句中，体会出“礼后乎”（礼后于忠信），孔子就对子夏大大赞扬了一番：“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”<sup>[1]</sup>《八佾》子贡能从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这两句描述卫武公修身问学、精益求精的诗句中，体会出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不如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的道理时，孔子也赞扬说：“赐也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<sup>[1]</sup>《学而》孔子要求弟子们要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《礼》，成于《乐》”。<sup>[1]</sup>《泰伯》

对于《周易》，孔子也是采用这种“兴”式方法来处理的。从帛书《系辞》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孔子是十分清楚《周易》是用来卜筮的，并且孔子也亲自用它来卜筮过，他说他的占卜准确率也不过是百分之七十（“吾百占而七十当”）<sup>[2]</sup>，但孔子对于《周易》是不看重它的卜筮作用的，他所喜好的是《周易》中的辞句。他说：“吾非安其用，而乐其辞。”<sup>[2]</sup>《帛书《系辞》》即孔子更强调《系辞》中所说的四个圣人之道中的“以言者尚其辞”之道。《子路》篇记载孔子的这样一句话：“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’善夫！‘不恒其德，或承其羞。’子曰：不占而已矣！”<sup>[1]</sup>孔子在这里就是引用《恒》卦九三爻辞来说明人要有恒心重要性。尽管我们对这一爻辞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：孔子在这里所关心的

仅仅是这一爻的辞句,而不是怎么用这一爻来占卜。今本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和帛书本《系辞》、《要》篇里有很多“子曰”一类的段落,我们虽不敢说这就是孔子的原话,但从它们所反映的思想来看,至少应是孔子弟子们所整理的孔子讲《易》的“课堂笔记”。在这些“子曰”里,孔子全部采取了“不占而已矣”的态度,用“兴”式方法进行联想发挥,最终归结到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大道上去。例如他对《中孚》爻辞“鸣鹤在阴,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,吾与尔靡之”的发挥是:“君子居其室,出其言善,则千里之外应之,况其迩者者乎?居其室,出其言不善,则千里之外违之,况其迩者者乎?言出乎身,加乎民;行发乎迩,见乎远。言行,君子之枢机。枢机之发,荣辱之主也。言行,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,可不慎乎?”<sup>[4]</sup>(《系辞》)这条爻辞很像一首古诗,前两句起兴,后两句道出所要说的内容。它的本意是说:一只鹤在暗处鸣叫,它的子女(或解作配偶)在应声唱和;我有好吃的东西,我与你一起分享。孔子在这里仅仅抓住了一个“和”字,加以引发挥。孔子的具体思路是:由鹤的唱和→远近的百姓对君子的言行所作出的反应→君子应慎言行。再如孔子对《节》卦初九“不出户庭,无咎”的解释是:“乱之所生也,则言语以为阶。君不密则失臣,臣不密则失身,凡事不密则害成,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”<sup>[4]</sup>(《系辞》)这条爻辞的意思非常浅明:不出大门,就不会有过失。而孔子却仅仅据“不出”二字,兴发出君子要小心谨慎、不随便乱讲话的大道理来,这种谨言慎行的思想与《论语》中所记载的思想是十分一致的。《为政》:子张学干禄。子曰:“多闻阙疑,慎言其余,则寡尤。多见阙殆,慎行其余,则寡悔。言寡尤,行寡悔,禄在其中矣。”<sup>[1]</sup>

孔子就是用这种“兴”的方法把《诗》和《周易》这类的古籍改造装修成儒家的富丽堂皇的经典的。当然,这种“兴”式的方法并不是孔子所首创的。据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古籍记载,春秋时期,“赋诗言志”已成为当时外交活动和列国公卿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据清赵翼《陔余丛考》统计,《国语》引《诗》三十一条;其中三百篇中的诗三十条;《左传》引《诗》二百一十七条,其中记列国公卿引《诗》一百〇一条(内逸《诗》三条),左丘明自引《诗》及转述孔子之言所引《诗》四十八条(内逸《诗》三条)。这些“赋《诗》和引《诗》不一定符合全诗的原意,而大多是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,即采用一首诗中一章或一句两句的形象和意义,按照赋者和引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来运用它们。”<sup>[5]</sup>

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中也记载了大量用《周易》卜筮的例子,这说明《周易》在当时的主要功用就是卜筮,但也有例外,《左传》中就记录了六条不用《周易》卜筮而只注重其辞句的例子,其中两条是孔子出生以前四、五十年的事,另四条也是发生在孔子五十岁以前的事。如:

宣公十二年(公元前597年):知庄子曰:“此师殆哉!《周易》有之,在师之临,曰:‘师出以律,否臧凶。’执事顺成为臧,逆为否。”

襄公二十八年(公元前545年,孔子六岁):子大叔归,复命,告子展曰:“楚子将死矣。不修其政德,而贪昧于诸侯,以逞其愿,欲久,得乎?《周易》有之,在复之颐,曰:‘迷复凶。’其楚子之谓乎?”<sup>[6]</sup>

孔子正是采用了当时通行的这种“兴”式方法来教授他的弟子的。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,当时人的“兴”都是随心所欲的,孔子所要求的“兴”则是有固定目标的,那就是“忠恕”之道,即要紧紧围绕着这一“忠恕”之道去“兴”、去联想发挥,而不要往那邪路上想。孔子说:“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思无邪。”<sup>[1]</sup>(《为政》)孔子的这个“思无邪”并不是就《诗》的本义来说的。《诗》中虽有《雅》《颂》之类歌功颂德的庙堂之歌,但也有“桑间濮上”的郑卫之音。孔子曾明确无误地说“郑声淫”,而对于“淫声”,孔子虽不像宋元时的道学家那样走极端,但也是深恶痛绝的,他要求要像“远佞人”那样“放郑声”。<sup>[1]</sup>(《卫灵公》)孔子能说“郑卫之音”的内容也是“无邪”的吗?实际上,孔子的“思无邪”是说的读《诗》方法,是要弟子们往“忠恕”之道上引申发挥。孔子是这样要求学生的,平时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。他曾对子贡说:“赐也,女予以为多学而识之者与?”对曰:“然。非与?”曰:“非也。予一以贯之。”<sup>[1]</sup>(《卫灵公》)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白,孔子不仅仅是多学广记,更重要的是总能从这些所学中体会出“忠恕”之道来。子贡领会了孔子这句话的精髓,所以当卫公孙朝问子贡“仲尼焉学”时,子贡回答说:“文武之道,未坠于地,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,不贤者识其小者,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,而亦何常师之有?”<sup>[1]</sup>(《子张》)

孔子不仅用这种“兴”式方法去学,去要求弟子,而且还要求弟子在教授再传弟子时,也要用这种方

法。他对子夏说：“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<sup>[1]</sup>（《雍也》）所谓“君子儒”就是要将“六经”中所蕴涵的儒家的“忠恕”之道传授给弟子，而不是仅仅像“小人儒”那样仅能把“六经”的辞句传授给弟子。孔子正是看出以“文学”见长的子夏有走“小人儒”道路的倾向，才提醒他要走“君子儒”之道的。

孔子的这种断章取义地抽取古《诗》、《易》等书中的辞句，从中引申发挥出“忠恕”之道的“兴”式方法被儒家后学继承下来，孟子、荀子是这方面的代表。

孟子被后世称为“亚圣”，是孔子的忠实崇拜者，他虽然提出了“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，以意逆志”<sup>[7]</sup>（《万章上》）的读《诗》主张，但由于他心里先有了一个《诗》是教化民众的工具的儒家框框，“意”这个大前提首先就偏了，再加他以古讽今的需要，所以对《诗》也完全采取了孔子断章取义、引申发挥的“兴”式方法。如《尽心上》：公孙丑曰：“《诗》曰：‘不素餐兮。’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君子居是困也，其君用之，则安富尊荣；其子弟从之，则孝悌忠信。‘不素餐兮’，孰大于是？”<sup>[7]</sup>《魏风·伐檀》里的这一句，本来是揭露“君子”不劳而获的，经孟子这么一发挥，就成了作官尊荣、不劳而获高尚了。再如《梁惠王下》：王曰：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货。”对曰：“昔者刘公好货，《诗》云：‘乃积乃仓，乃裹餼粮，于橐于囊。思戢用光。弓矢斯张，干戈成列，爰方启行。’故居者有积仓，行者有裹囊也，然后可以爰方启行。王如好货，与百姓同之，于王何有？”王曰：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”对曰：“昔者太王好色，爱厥妃。《诗》云：‘古公亶父，来朝走马，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，爰及姜女，聿来胥宇。’当是时也，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。王如好色，与百姓同之，于王何有？”<sup>[7]</sup>孟子在这里所引用的是《大雅》里的《公刘》和《绵》两首诗，这两首诗本来是周人追忆其先祖公刘和古公亶父艰苦创业的，与“好货”“好色”根本没有关系，经孟子这么一发挥，又成了古圣先王也好货好色，但能“与民同之”的说教了。

荀子是战国末期的最后一位儒家大师，他兼取百家，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高度。他十分重视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的学习，说学习它们就可以为人、为士、为圣人；不学就是禽兽。他是把这些典籍推崇到“经”的地位的先驱者，他说：“圣人也者，道之管也；天下之道管是矣，百王之道一是矣。故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道归是矣。《诗》言是，其志也，《书》言是，其事也，《礼》言是，其行也，《乐》言是，其和也，《春秋》言是，其微也。故《风》之所以为不逐者，取是以节之也；《小雅》之所以为《小雅》者，取是而文之也；《大雅》之所以为《大雅》者，取是而光之也；《颂》之所以为至者，取是而通之也。天下之道毕是矣。乡是者臧，倍是者亡；乡是如不减，倍是如不亡者，自古及今，未尝有也。”<sup>[8]</sup>（《儒效篇》）

在他看来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，尤其是全部《诗经》，无不体现着“圣人之道”。有一点我们需注意，荀子在这里虽没把《周易》作为人们学习的必读书，但这并不说明荀子不读《易》。刘向《校荀子叙录》称，荀卿善为《易》，其义略见《非相》《大略》二篇。

荀子注重六经，而他的读经方法，也完全继承了孔子断章取义、引申发挥的“兴”式方法，这既可从上文所引他对五经内容评判上看出一二，又可从他书中引经、用经的方式上看出端详。

《荀子》全书三十二章，其中论《诗》七处，征引《诗》句八十一处（内有逸《诗》六处）。他征引《诗》句，也大都采用断章取义、引申发挥的“兴”式方法。他往往先说一番道理，然后引《诗》句作结，以此来证明他说的道理古已有之，但他所引《诗》的本义往往与他所讲的道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如《修身篇》：

谄谀者亲，谏争者疏，修正为笑，至忠为贼，虽欲无灭亡，得乎哉！《诗》曰：“喻喻皆咎，亦孔之哀。谋之其臧，则具是违；谋之不臧，则具是依。”（《小雅·小旻》）此之谓也。

又：故人无礼则不生，事无礼则不成，国家无礼则不宁。《诗》曰：“礼仪卒度，笑语卒获。”（《小雅·楚茨》）此之谓也。

《大略》：诸侯召其臣，臣不俟驾，颠倒衣裳而走，礼也。《诗》曰：“颠之倒之，自公召之。”（《齐风·东方未明》）天子召诸侯，诸侯辇輿就马，礼也。《诗》曰：“我出我舆，于彼牧矣。自天子所，谓我来矣。”（《小雅·出车》）<sup>[8]</sup>

荀子对于《周易》，也是采取了与孔子相同的“善为易者不占”的态度，在《非相篇》，他说：“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，而君子为甚。故赠人以言，重于金石珠玉；观人以言，美于黼黻文章；听人以言，乐于钟鼓琴瑟。故君子之于言不厌。鄙夫反是，好其实，不恤其文，是以终身不免坤污傭俗。故《易》曰：‘括囊无咎’”

无誉。’腐儒之谓也。”<sup>[8]</sup>荀子在这里也仅仅是利用了《坤》六四爻辞进行“兴”式引申发挥,把卦爻辞所说的“扎上布袋口,既无咎过,也得不到称誉”引申发挥到腐儒不要人讲话上来。

又如《大略篇》:礼者,以财物为用,以贵贱为文,以多少为异。下臣事君以货,中臣事君以身,上臣事君以人。《易》曰:“复自道,何其咎?”《春秋》贤穆公,以为能变也。<sup>[8]</sup>

汉统一之初,虽重黄老,但儒学并未断绝,它仍沿着孟、荀以来的老路子。我们看一下汉初名儒陆贾对“六经”的理解就会明白这一点,他在《新语·道基》中说:“阳气以仁生,阴节以义降,《鹿鸣》以仁求其群,《关雎》以义鸣其雄,《春秋》以仁义贬绝,《诗》以仁义存亡,乾、坤以仁和合,八卦以义相承,《书》以仁叙九族,君臣以义制忠,《礼》以仁尽节,《乐》以礼升降。”<sup>[9]</sup>在这里,“六经”又成了陆贾劝刻郢去秦暴政酷刑、施行仁义的思想库。

自从董仲舒上了他的“天人三策”,汉武帝下令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后,“五经”被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,经学逐渐成了汉代统治者的思想基础。《周易》和《诗经》也被人广泛地传习。虽然西汉宣帝以前的研究《周易》和《诗经》的著作流传到现在的不多,但从古籍中记载的当时人们引用《周易》和《诗经》的情况,仍可看出人们读《易》读《诗》还是走的孔子的“兴”式的路子。如:

《汉书·武帝纪》:诏曰:“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,德未能绥民,民或饥寒,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。冀州雕壤乃显文鼎,获荐於庙。渥洼水出马,朕其御焉。战战兢兢,惧不克任,思昭天地,内惟自新。《诗》云:‘四牡翼翼,以征不服。’亲省边垂,用事所极。望见泰一,修天文祥。辛卯夜,若景光十有二明。《易》曰:‘先甲三日,后甲三日。’朕甚念年岁未咸登,飭躬斋戒,丁酉,拜况于郊。”<sup>[10]</sup>

还有一个例子,也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。昌邑王贺,荒淫无耻,在继昭帝而立后,仍不思悔改,霍光不得不把他废了。原先辅佐他的一帮臣子多半被杀了,只有龚遂和王吉因数次上谏书劝贺而得免死,黥为城旦。贺的太傅王式也被抓到大牢,也要处死。当治事使者责问王式,身为太傅,为何没有谏书谏王时,王式回答说:“臣以《诗》三百五篇朝夕授王,至于忠臣孝子之篇,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;至于危亡失道之君,未尝不为王流涕深陈之也。臣以三百五篇谏,是以无谏书。”<sup>[10]</sup>(《儒林传》)使者把这话回报上去,王式也得以免死。以三百五篇当谏书,就说明王式读《诗》用《诗》也是遵照的孔子“思无邪”的“兴”式路子。

宣帝时期,以经学讲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逐渐盛行,到元、成时期更是占据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,讲灾异的孟、京《易》学成了这时的显学,齐《诗》中的翼氏学派也专门讲灾异,这些人虽也常常借鉴孔子的“兴”式方法,对《诗》《易》的辞句引申发挥,但离孔子“思无邪”的路子是渐行渐远了,到哀平之际经生们把谶纬也拉进来的时候,更可以说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反对孔子了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|  |  |
|--|--|
| [1]邢昺. 论语注疏[M]. 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,1980.  | [6]孔颖达. 春秋左传注疏[M]. 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,1980. |
| [2]张立文. 帛书周易今注今译[M]. 台北:台湾学生书局,1991.   | [7]孙奭. 孟子注疏[M]. 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,1980.    |
| [3]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           | [8]王先谦. 荀子集解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           |
| [4]孔颖达. 周易注疏[M]. 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,1980. | [9]王利器. 新语校注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           |
| [5]夏传才. 诗经研究史概要[M]. 中州书画社,1982.        | [10]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             |

(责任编辑:王 萍)